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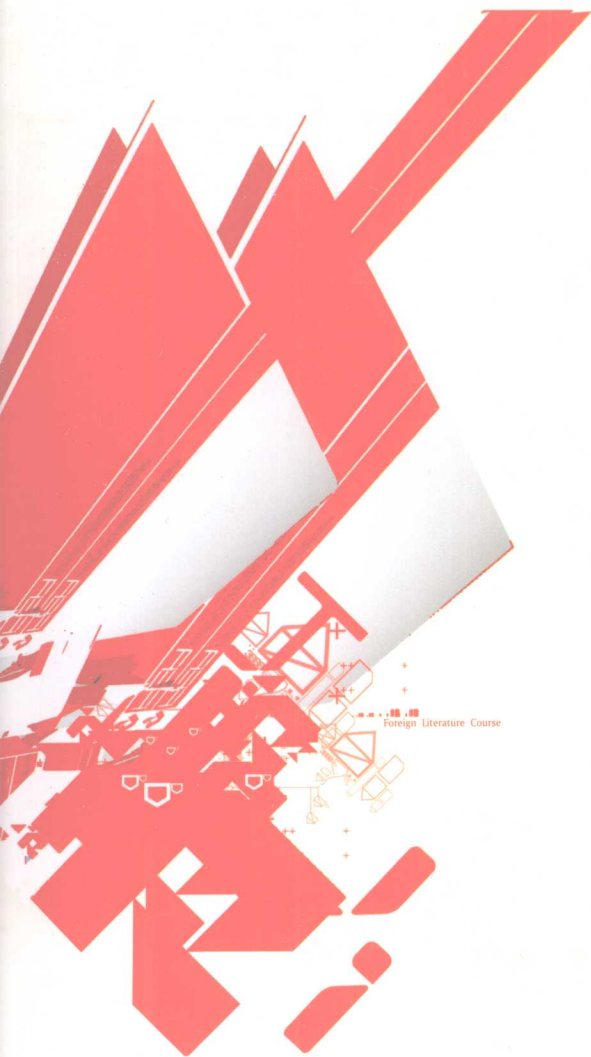
普通高等院校规划教材·高等素质教育探索教材

吴舜立 编著

外国文学教程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

- 应试教育的地位『岿然不动』，高校作为素质教育的最后阵地已岌岌可危；
 - 现代社会的多元发展态势，更加凸显人文综合素质培育的重要。
 - 单纯就读书学习而论，培根早已有言：有些书粗泛读即可；
 - 高校时下双模式学分制教改又使课时大幅压缩。
- 笔者就有了本教材的编撰理念和架构体系。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院校规划教材·高等素质教育探索教材

Foreign Literature Course
外国文学教程

吴舜立 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代号:JC8N126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教程/吴舜立编著. -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613-4401-9

I. 外... II. 吴... III. 文学史-外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6769号

外国文学教程

吴舜立 编著

| | |
|------|---|
| 策划组稿 | 雷永利 |
| 责任编辑 | 李慧娜 |
| 责任校对 | 安雄 |
| 视觉设计 | 吉人设计 |
| 出版发行 |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社址 |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邮政编码:710062) |
| 网址 | http://www.snupg.com |
| 经销 | 新华书店 |
| 印刷 | 陕西宏业印务有限公司 |
| 开本 | 787mm×960mm 1/16 |
| 印张 | 25.25 |
| 字数 | 404千 |
| 版次 | 2009年1月第1版 |
| 印次 |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
| 书号 | ISBN 978-7-5613-4401-9 |
| 定价 | 38.00元 |

电话:(029)85303622(传真) 85307826

E-mail:jcc@snuph.com

林焯棠、李海、李素等编·林焯棠、李海、李素等编

本教材获教育部首批特色专业
“汉语言文学”建设经费资助

著者 李海

机械工业出版社

期盼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材百花争艳

韦建国

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举国上下呼吁多年,然而效果甚微。基础教育由于高考指挥棒威力所致,应试教育“岿然不动”,令人担忧的是高等教育阵地也被浸染。

长久以来,高校中文专业外国文学课教学过分强调知识的传播,忽视了学生才能、素质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在课堂教学上重知识传承,轻能力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在课程内容上一味追求大而全,缺乏舍旧取新详略得当的灵活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教师满堂讲笔记,学生机械记笔记,考试时背笔记,考试后忘笔记”的不良倾向。

从“以书为本”的知识教育向“以人为本”的素质和能力教育的变革,就必须改变旧有的“追求知识积累”的思维定势,强化人文精神,注重能力培养,这是当前高校文学课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因而教材的改革创新势在必行。

教材不同于学术专著,它要体现确定的教学要求和规范。面对越来越多的种种要求和规范,教材编著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就形成了教材千篇一律、枯燥无味的局面,这已是现今外国文学教材的通病和痼疾。再加上编著者受传统理念的影响,过分注重体系的建构,追求知识的系统性,教材越编越大而全,越写越厚重。

翻阅吴舜立老师编著的《外国文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创新气息扑面而来。

《教程》大胆地淡化了以往教材过重过细的历史梳理,只列单章对东西方文学史做了粗线条的勾勒,只求学生做到对外国文学知识体系基本清楚。编著者将大量的篇幅用于各个时期主要文艺思潮、代表作家作品的介绍和分析。

《教程》编著者考虑到师范教育重逻辑、重形象、重基础知识的特点,编入了较为详细的作品故事梗概。同时,出于培养学生思维、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教程》在解读和评析文学现象时,提供了多样的思路 and 答案;在每章后都设计了灵活的讨论题,鼓励学生在讨论中自由发挥,能自圆其说即可。

《教程》的编著者在参考众多教材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

研成果,使《教程》具有了其他同类教材所没有的特点。

比如,现有教材教学内容结构设置模糊不清,有的教材是先写东方后写西方,如马家骏等主编的《世界文学史》;而包括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在内的大部分教材是先写西方后写东方。在课程安排上,绝大部分高校也是先讲西方后讲东方,重西方轻东方。《教程》编著者认为原因在于,编写者忽略了东方文学的产生远远早于西方文学的时间因素,没有顾及到东方文学在古代和中古时期对西方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学术因素,归根到底还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所致。《教程》把东方文学内容放在前面,恢复了世界文学史上先“东学西渐”后“西学东渐”的史实,有利于学生清晰和系统地把握整个外国文学学科。

再如,《教程》在对日本文学的评析中,加入了其他教材没有的见解,这恰恰是编著者学术研究的成果再现。这种情况在《教程》中并不少见,真正体现了《教程》创新的个性特点。

《教程》对众多教材里的“外国文学”、“世界文学”、“西方文学”、“东方文学”、“欧美文学”、“亚非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等混乱的学科名称作了编著者所理解的统一和规范,对其他教材里作家、作品、形象不统一的汉语译名,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加以规范。

《教程》远非完美无缺,其中部分理念、观点还值得商榷,其结构体系还有待于教学实践的检验,但是,其创新精神和个性特点不容忽视。

教材应该允许各种不同风格的存在,允许有编著者的个性表现,只有有了“各式各样”的教材,才能通过教学实践的检验优胜劣汰,进而促进高校外国文学课程的良性改革。

据统计,现已出版的外国文学教材多达百余种,其中优秀者也不下十余部,但完全适于师范院校教学的尚不多见。我们期盼以《教程》的出版引来高等师范院校外国文学教材百花争艳的局面。

刍议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吴舜立

外国文学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和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经过几代学人的长期努力,目前在学术研究、学科建设、师资队伍、教材编撰诸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然存在问题,需要学界的关注和思考。

问题一:名称不够统一和规范

这首先体现在学科名称上,有“外国文学”、“世界文学”、“西方文学”、“东方文学”、“欧美文学”、“亚非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等,不一而足,甚是混乱;其次体现在教材和著作名称上,而这又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由于学科名称不统一不规范,学者们编撰的教材也是各有其名、五花八门。例如,石璞著,四川人民出版社《欧美文学史》(1980年);陶德臻、马家骏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世界文学史》(1993年);郑克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外国文学史》(1999年);杨昌龙主编,西北大学出版社《西方文学史纲》(1992年);郁龙余、孟昭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文学史》(2001年),等等。二是有的教材称为“史”,有的教材不叫“史”。例如,朱维之、赵澧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用于本科教学的叫《外国文学史》(1994年);同样的主编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用于专科教学的则叫《外国文学简编》(1999年);另外还有蒋承勇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1997年),等等。其三,表现在课程名称上,具体就是课表上出现的课名。例如,陕西师范大学一度笼统都叫“外国文学”,后来又分别叫“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现在出现在课表上的则成了“外国文学(一)”、“外国文学(二)”、“外国文学(三)”。其四,人物形象译名、作家译名和作品译名也存在不规范不统一的现象。例如,法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Stendhal,郑克鲁本译作司汤达,而朱维之本则译成斯丹达尔;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头号英雄Achilles,有译阿喀琉斯的,有译阿基琉斯的,还有译作阿契里斯的;17世纪古典主义戏剧家莫里哀笔下著名的伪君子形象,朱维之本译作答丢夫,郑克鲁本译作达尔杜弗,其他还有译作答尔丢夫的;19世纪英国湖畔派诗人Coleridge,朱维之本译作柯尔律治,郑克鲁本则译作柯勒律治;19世纪法国浪

漫主义作家雨果的成名作 *Hernani*, 朱维之本译作艾那尼, 而郑克鲁本则译作欧那尼; 阿拉伯著名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女主人公形象, 有的教材译作马尔基娜, 有的教材译作美佳娜等等, 不胜枚举。

这种各主其张、各自为政的局面, 在教学和科研中无疑会给人们带来困惑与迷惘。往小了说, 它影响了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和明晰性, 影响了学分制、双模式教改体系下学生的自由选课和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往大了说, 它伤害着学科存在的严肃性和科学性, 最后无疑会影响本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建议一: 学科名称就叫“外国文学”, 因为这一名称简明而直观地界定了这一学科的范围和性质; 而“世界文学”的名称就缺乏这一优势。因为从字面意义看, “世界文学”应当包含中国文学在内, 但实际上并不包括; “比较文学”若是从中国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文学比较这一层面来看, 应是纯粹的外国文学; 但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也属于它的范畴。如果把它划入外国文学范畴, 它又涉及中国文学; 如果把它划入中国文学范畴, 它又涉及外国文学。所以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而不是一门学科, 则更合理、更富操作性。实际上, 比较文学的历史事实和发展现状都充分说明这一点。比较文学最初就是作为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的一种方法而被运用的, 尤其是 19 世纪中期, 学界发现印度寓言故事集《五卷书》中的寓言故事在许多民族和国家之间都有广泛流播, 但却各有异同, 于是便进行了集中的比较分析, 后来由于理论上的归结和提升, 这种对比分析的方法就被当成了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但目前由于比较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方式方法的陈旧单一, 反而失去了学科自身的范畴支撑和质的规定性而越来越显示出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笔者以为, 不应悲观地把这一状况看做是比较文学的穷途末路, 而应坦然地认为这是比较文学的返璞归真。另外, 把比较文学定性为一种方法, 也有利于学术研究上的实际操作和组织管理。比如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人撰写了一篇沈从文与川端康成比较的论文, 他的着眼点肯定在沈从文, 川端康成只是评析沈从文的一个参照系, 你就不能因此把其划分到外国文学研究阵营里来; 同样, 搞川端康成研究的人写了这样一篇论文, 你就不能让其去参加研究沈从文的学术会议。正因为比较文学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 所以不同学科的人都可以运用它。

建议二: 教材和课名相应的就叫“外国文学”, 欧美和亚非则相应的以西方和东方来区别。尽管“东方文学”可以换称为“亚非文学”, 但由于其中的“东方”一词并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并不单纯指地球的东半部)以及其独特的历史渊源(“东方文学”是从“东方学”Orientalism 分离出来的), 所以还是称作“东方文学”为好。同样, “西方文学”的命名也并不单纯是依据地理学意义上的西半球,

加之其沿用已久又能与“东方文学”明显区别,因而也不要随使用“欧美文学”来取代。

不管是总名称还是分名称,都不要以“史”来命名,中文专业的文学课没有一门是只讲历史线索而不讲作家作品的,它们应是作家论、作品论、文学理论和发展史的四位一体,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作家作品是基础和前提。当前由于信息时代知识更新越来越快,一些钩沉式的内容愈发显得苍白无力,有些文学现象也大可不必进行历史追溯。

建议三:形象、作家和作品的译名,也应当统一和规范。我国在翻译外国人名时基本上遵循的是音译原则。由于外国人名在发音上存在强弱音,翻译成我们音节响亮而一音多字的汉语时有所突出和取舍本无可厚非,但从教学和学科的角度出发就不应该太随意。不顾及学科的严肃性,起码也应该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比如说马尔克斯,译成马克思就不妥;高尔基,你就不能译成高耳鸡。由于汉语的表意性和音节化特点,我们中国人识记外国人名本来就不容易,若再不统一和规范,必定增加人们学习它的难度,降低人们关注它的兴趣。其实,关于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使用外国文学的汉译名称,学界是有一个标准的,这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1982年)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1996年)。

问题二:教学内容的结构设置模糊不清

具体说就是在先上东方部分还是先上西方部分的顺序上不够统一。这一点表现在教材编写上,更表现在各高校的课程安排上。教材编撰上,如马家骏等主编的《世界文学史》(上下册)是先东方后西方,而郑克鲁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上下册)是先西方后东方。课程安排上,绝大部分高校是先西方后东方,只有极少数学校是先东方后西方。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人们认识上的偏差以及教材和师资队伍等方面的因素,长期以来高校中文专业的外国文学课只讲西方文学,造成了人们把西方文学等同于整个外国文学的错误认识。现在,高校虽然普遍开设了东方文学课,但不是作为西方文学课的补充以选修课的面目出现,就是作为高年级毕业前的知识补课,被安排在最后一两个学期。笔者以为这一做法欠妥。原因一:虽然外国东方文学的教学与科研在我国高校起步较晚,但这并不等于东方文学的成就不值一提,其影响力就不及西方文学。教学上把东方文学置于西方文学之后的做法说到底还是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表现。原因二:这一做法忽略了东方文学的产生远远早于西方文学的时间因素。众所周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现象出现在东方的古埃及,时间为公元前四五千年;而西方最早的文学则是公元前两千年出现的古希腊文学,西方比东方晚两千多年。原因三:这一做法没有顾及东方

文学在古代和中古时期对西方文学乃至整个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学术因素。众所周知,虽然在人类文化、文学史上,近现代时期是西方影响东方的“西学东渐”,但古代中古时期却是东方影响西方的“东学西渐”。由于东方文化底蕴的博大精深,某些西方的思潮理念,追根溯源仍在东方。原因四:这样做会干扰并降低学生对整个外国文学学科知识理解的清晰度、系统性。原因五:这一做法忽视了中国文学是东方文学的一部分以及东方是中文专业最基本的文化背景这一史实。且不说中国语言文学与东方文化文学之间关系之密切,单就文化背景而言,滞后东方文学就可以被看做是对中文专业根基和底蕴的一个轻视,久而久之可能会影响中文专业其他学科的教学和研究。

问题三:课程内容上,一味追求大而全,缺乏舍旧取新、详略得当的灵活性

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教材内容的设置编写上,重体系建构、求知识系统,唯恐漏了哪个作家作品,少了什么传承影响。在这样的理念支配下,近几年教材编撰上的推陈出新倒挺快,但大都架构偏大、内容偏多、讲解偏细。就拿各个大专院校采用率较高的朱维之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来说,当时就存在着教材内容多计划课时少的矛盾,1994年第二版时,按该书《再版后记》中介绍“在古代欧洲文学部分,增加早期基督教文学及其优秀作家路加。在20世纪欧美文学部分,增加劳伦斯、艾略特、萨特、贝克特、海勒、马尔克斯等节,把文学史的时限延伸到本世纪末”;2004年第三版面世时,按其后记说明“增加了《波德莱尔》、《帕斯捷尔纳克》、《福克纳》、《纳博科夫》四节”。按说,教材可以这样编,课堂上绝对不能这样讲。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过分倚重并拘泥于教学计划,从远古到当代,教师们都是面面俱到、细细讲来,唯恐线索不清晰、知识不系统。

众所周知,我国高校现在都已实现了从学年制向学分制转变的国际接轨,有人在谈到两者的本质区别时说:学分制的实质是教学计划、教学安排的灵活性,学习时限和学习内容的选择性,课程考查的变通性和培养过程的指导性;而传统的学年制则以教师、教材为中心,将教学计划统得过死,教学方法满堂灌,人才培养模式千篇一律,忽视了学生志趣与个性差异,影响了对学生的能力和素质教育。^①由此看来,教学内容设置和安排上的大而全和缺乏取舍,归根结底还在于重知识传承、轻能力素质的落后教育理念。

笔者曾接触过两位外国留学生,一位在剑桥攻读英国文学,但老师却不给他们讲莎士比亚;一位毕业于西班牙某大学文学专业,但却不知道其民族文学

^① 齐玉萍:《论学分制与学年制的关系》,载《教学研究》2002年3期。

之父是维加。乍一听很是不解,但当后来听说老师喜欢给他们讲现当代作家,笔者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道理。想必是现当代的文学现象蕴含着比古代更为复杂多维的思想和思考,找好切入点,更容易以点带面、举一反三。他们这样做是侧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少点历史的积淀,反而更容易发挥创造性。俗话说得好:积重难返。我们不妨来做这么一个假设:如果教材都得这么体系严整地编,教师都得这么从古到今地教,学生都得这么一应俱全地学,那么几个世纪之后我们的文学课教材将会厚不堪读,内容也将多不堪学,课时也将长不堪耐,说不定连学制也得增加。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提出了一种极有远见的观点,即教材应该允许各种不同风格的存在,允许有教师的个性表现,允许有“各式各样”的教材。清华大学外国文学教授徐葆耕也指出:体现确定的教学要求和规范,这是教材同学术专著之间的区别。但是因此把教材写得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已经成为现今教材建设的通病和痼疾。这种通病和痼疾的根源在于,以为文科教学仅传授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 and 观点,而不是以启发学生的创造精神、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依归。青年学生对新生事物是最敏感的,那种千篇一律的教材对他们而言,仅是考试时争取分数的工具。真要获取知识时,他们所读的是另外一些书。^①

结论是显而易见的:高校外国文学在教材编写理念和课程内容设置上不应拘泥于大而全的历史体系和知识架构,而应根据能力培养和素质教育的目的,在教学内容上有相当的避陈就新和详略得当的自由度与灵活性。教材编写理念上,虽说教材要给学生提供某种固定的知识框架,但侧重点一定要放在启迪智慧和增强素质上;课程内容设置上,虽说不一定像上述列举那样厚今薄古,起码也应该做到对名家和名著的格外突出,尤其是那些意贯古今、蕴含丰厚、立意高远、涵盖深广的大家大作,可以大讲而特讲,其余则完全可以少讲或不讲。因为,当今的大学生思维活跃、情感炽热、眼光敏锐,他们对于新知识、新问题充满热情和好奇,如果教学内容陈旧,与现实远离、同时代脱节,自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他们不仅难以接受,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在这个问题上,有人提出“四点式”教学模式,即: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设置尽量要“抓住共鸣点、解除困惑点、把握兴奋点、升华闪光点”,^②笔者以为值得大力推广。

① 徐葆耕:《西方文学十五讲》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② 钱焕奇:《高校“两课”教学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方略》,载《高校理论战线》2001年第8期。

问题四:课堂教学上,存在明显的“一重两轻”,即重知识传承、轻能力培养和人文素质

在“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的理念支配下,长久以来,高校教学过分强调知识传播,而忽视了学生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才能、素质和个性的全面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校园的人文精神受到冷落,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发生了明显裂变。对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各种文学课责无旁贷。

著名外国文学专家乐黛云指出:“文学,常是文化的象征和集中表现”。^①而伴随着知识爆炸、信息密集、网络文化和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特征和社会需要,文学现象和人们对文学的解读,也越来越趋向于综合化、多样化、人文化和创新化。这就要求我们改变以往那种“以书为本”的知识教育,向“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 and 能力教育加快演进。

昔日那种抱着厚厚的教材或拿着纸页发黄的讲稿口沫飞溅地进行知识灌注的教学模式只能使学生昏昏欲睡。在外国文学教学中,跳出以往那种“以教材为中心”、“追求知识积累”的思维定势,强化人文精神,重视非智力因素,注重能力培养,应是当前高校中文专业外国文学课(抑或是所有文学课)教学改革中的重中之重。前不久在苏州召开的全国“新世纪东方文学研究与教学学术研讨会”上,青岛大学教授侯传文就外国文学教学中“引入大文学观念,强调挖掘文学文本中的超文学意义”作了专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反响。所谓“大文学观念”就是大的文化背景下的文学;所谓“超文学意义”就是文学的人文精神、文化底蕴。^②外国文学课教学,并不是单纯的知识灌输,而是人文精神的培养和滋润。如果说校园是社会的最后一方净土,那么人文精神就是校园永恒的主题。在这个文化的伊甸园中,充溢着鲜活的青春骚动,飞旋的生命舞步。学生怀着急切的求知欲望,为的是捕捉理想、信仰和真理。特别是对迷失了生命航船坐标和迷失了自我的那一部分学生群体,他们需要重新审视、重新认识的东西实在太多。因而外国文学课教学就必须引进新观念,必须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的提高和完善,让教学内容浸润文化古老的辉煌和现代的光环,从而将课堂变成真正的人文精神的起跑线和加油站。德国教育家劳达厄说过:“重要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教育无非是一切已经学过的东西遗忘掉的时候剩下来的东西。”^③而英国著名教育家洛克则强调:“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

① 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

② 侯传文:《跨文化视野中外国文学研讨会开幕辞》,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

③ 转引自谢南斗:《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新思路》,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①所以,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讲授知识而是育人育心,培养他们“大写的人”的完美人格。如果我们单纯地传授知识,那么我们就不是创造型的教师而是操作型的工匠了;如果学生也是单纯地接受知识,那么他们也就不会对知识进行创新而只能是旧知识的机械重复者。

当代人才的竞争首先表现为综合素质的竞争,隐藏于其后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单纯的知识,而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非智力因素。这些非智力因素体现为大学生的感性幻想能力、理性思维能力、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敢于探索和创新的精神、顽强的意志和实事求是的学风,并成为衡量学生道德、人格、精神、文化学识等方面成长的基本尺度。

问题五:教学手段和方法单一死板、陈旧落后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由原来的知识传授向素质培养的转变,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也成了当务之急,这就是从原来老旧、单调、死板的“三一模式”(即一张嘴、一根粉笔、一块黑板)尽快向现代、多元、灵活的方法和手段转变。而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多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在高校教学中,尤其是在中文专业的外国文学教学中,越来越显示出其独有而重要的效用。

首先,把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引入高校外国文学课教学,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综合化、自然人文融渗化、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知识经济飞速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等趋势,都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并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说,信息时代、网络浪潮、市场经济日复一日地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信息革命、资源共享、网络文化和数字化生存等全新理念迅速在大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一方面,大学生们身处于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的多媒体不仅是他们应该掌握的技能,而且是他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也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信息化、网络化的海洋里畅游,长久地耳濡目染、操作实践,他们感受事物的敏感度、认知事物的方式等就难免被网络技术潜移默化。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大学生群体明显出现了世俗化和功利化趋势。他们忙于搞家教,忙于参加各种商务广告和推销活动,忙于找工作。这种人心浮动的状况,使得大批学生身在教室而心系挣钱,对学习内容有疏离与厌倦感,更不用说当这种内容和传递它的方式一成不变的时候。在这种情势下,改变以往陈旧的“三一模式”,及时地在外国文学课教学中引入多媒体网络技术,就成了时代精神的要求,社会发展的需要。

^① 转引自谢南斗:《外国文学教学改革新思路》,载《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3期。

其次,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能充分体现文学课自身的特点。各种文学课是高校中文专业的必修课,而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都离不开形象思维,这就决定了文学课自身的两大特性:生动形象性和审美教育性。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因为它们都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观念和模式下,即使是高校的文学课,我们也已习惯于把它条块分割、点面俱到。尤其是对一些生动丰富、包孕性极强的单个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的细部,也要进行逐条逐点的条分缕析,教师唯恐知识上有遗漏,学生就怕要点没有记住。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老师课堂讲笔记、学生课堂记笔记、考试的时候背笔记”的机械重复和恶性循环。殊不知,这样既违反了文学的规律和文学课的特点,又禁锢了学生的独立思考尤其是他们的创造性思考,其结果只能是使学生既没有人文素养,又缺乏创造性思维。也许知识积累了不少,但充其量只能是知识多素质低。

在教学中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一是能大量随机地采用音像资料来增强文学课教学的形象性;二是对一些时代巨著和争议颇大的名著则直接给学生播放录像,让学生直面名著。这样一来,不仅把文字性的东西具象化、平面性的东西立体化了,而且把静止的东西生动化、一维度的东西多维化、单调性的东西多样化了,充分达到了文学课教学形象生动、有声有色的效果。

其实,运用多媒体技术增强外国文学课教学的形象生动性,不光是手段,而且还是目的。因为这样做的最终效果还是要落在对学生的素质教育上。可以说长期的注重知识积累的应试教育,已经损伤了学生们的想象力,甚至包括中文系学生在内。笔者在给学生们讲课时,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在讲授印度神话传说时,先要求学生依据文字描述对某些形象和场景作一下想象,然后播放相应的影像资料,结果满场学生一片惊讶和唏嘘。惊讶是因为他们的想象力与印度神话形象的奇异性和丰富性之间的差距还很大;唏嘘则缘于色彩鲜明而形象逼真的影像资料给了学生们极大的视觉冲击。如果说前者对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能造成一种强大的刺激和触发的话,那么后者对学生的审美感受力无疑是一种直接的熏染和陶冶。

第三,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是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传统的教学模式可以概括为以教师为主体的单向式地向学生的知识灌输。这里教师的作用是主要的,他们是知识的权威,课堂上满堂灌,课后还得做他们布置的思考题,这样,学生的时间基本上被老师占据了。殊不知,教师对学生的作用不是无限的,在高等教育中教师的作用尤其应该加以限制。首都师大教育科学研究院邢永富教授撰文指出:应试教育和传统教育存在的教师作用“半径”过长、侵占学生个人学习和发展时空的问题,是导致我国学生缺乏想象力、创造力

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他提出,具备高素质高品位的教师不是用知识育人,而是用思想育人,知识只是手段和工具,是育人的载体。^①

由以教师为主体的知识灌输式向以学生为主体的思维启发式转变,是我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而计算机多媒体的交互式技术为这一转变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就拿外国文学课来说,以往的教学模式是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学生在讲台下方懵懵懂懂地听、匆匆忙忙地记。而现在有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情况就可以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一,教师可以借助计算机多媒体的音频视频技术,更多地给学生提供和展示原始性的资料,让学生拥有对自己学习对象的新鲜感和兴趣度,从而给学生创造更多的自由思维、独立思考的机会。其二,通过计算机多媒体交互技术,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适时地向老师提出问题请老师解答;还可以借此机会发表自己的见解,以活跃大家的思维。其三,采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加强学生对教学活动的参与程度。例如,在课堂上,让学生朗读投射在银幕上的用来举例的短作品或长作品的段落,这是对学生表达能力和表演能力的即时训练;播放完名著名片后,通过适当讨论选出佼佼者,让其上台宣讲,这对师范专业学生毕业后走上讲台是一种很好的提前练兵……真正做到让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增强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性。其四,灵活多样、有声有色、双向互动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一改过去呆板、生硬、严肃有余的课堂气氛,营造出宽松、生动活泼的教学氛围。只有在宽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中,学生的思维才可能活跃;只有思维活跃了,他们的创新意识才可能被激活;创新意识激活了,创新能力就会不断提高。可见,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大大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

以上问题,虽不能说相当普遍,但已十分突出。若再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思考,势必给高校中文专业,尤其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专业“外国文学”的教学和科研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这也就是笔者编著这部探索性教材的初衷和目的所在。

^① 邢永富:《科教兴国、教育为本》,载《教育研究》2002年第8期。

目 录

| | |
|----------------------------|-------|
| 刍议高校“外国文学”教学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 (1) |
|----------------------------|-------|

上编 东方文学

| | |
|--------------------|-------|
| 第一章 东方文学发展历程 | (3) |
|--------------------|-------|

| | |
|--|-------|
| 第二章 《吉尔伽美什》(Epic of Gilgamesh)——人类文学史上的 第一部史诗、古巴比伦文学的杰出代表 | (7) |
|--|-------|

| | |
|--|--------|
| 第三章 《圣经·旧约》(The Bible·Old Testament)——影响世界 的“万书之书”、古代希伯来民族的文学总集 | (13) |
|--|--------|

| | |
|---|--------|
| 第四章 迦梨陀娑(Kalidasa)的《沙恭达罗》(Sakuntala)——古代 世界戏剧的高峰、印度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 | (37) |
|---|--------|

| | |
|---|--------|
| 第五章 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世界民间文学最壮丽的纪念碑、中古阿拉伯文学的 最高成就 | (54) |
|---|--------|

| | |
|--|--------|
| 第六章 紫式部(Murasaki Shikibu)的《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世界上出现最早的长篇小说、日本古代文学 的经典 | (70) |
|--|--------|

| | |
|---|--------|
| 第七章 海亚姆(Khayam)的《鲁拜集》(Rubai Yat)——英语国家 流播最广的东方诗集、中古波斯哲理诗的最高峰 | (82) |
|---|--------|

| | |
|---|--------|
| 第八章 泰戈尔(Tagore)及其《吉檀迦利》(Song Offering)——近 代印度文学的泰斗、亚洲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 (93) |
|---|--------|

- 第九章 纪伯伦(Gibran)及其《先知》(The Prophet)——东方呈现
给西方的最好礼物、现代阿拉伯文学的代表 (126)
- 第十章 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及其《雪国》(Snow Country)
——东西合璧的典范、日本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152)

下编 西方文学

- 第一章 西方文学发展历程 (177)
- 第二章 “荷马史诗”(Homer Epic)——古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 (183)
- 第三章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奥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古希腊戏剧的代表、西方悲剧的典范 (196)
- 第四章 但丁(Dante)及其《神曲》(The Divine Comedy)——欧洲
中世纪文学的杰出代表 (202)
- 第五章 塞万提斯(Cervantes)及其《堂·吉珂德》(Don Quixote)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人文主义文学的代表 (214)
- 第六章 莎士比亚(Shakespeare)及其《哈姆雷特》(Hamlet)——
欧洲人文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 (223)
- 第七章 莫里哀(Moliere)及其《伪君子》(The Imposter)——欧洲
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 (242)
- 第八章 歌德(Goethe)及其《浮士德》(Faustus)——欧洲启蒙主
义文学的最高峰 (250)
- 第九章 雨果(Hugo)和他的《悲惨世界》(The Miserable)——19
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268)
- 第十章 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
19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 (284)
- 第十一章 巴尔扎克(Balzac)及其《高老头》(Pere Goriot)——法国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 (292)
- 第十二章 易卜生(Ibsen)和他的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西方戏剧史上的里程碑 (306)
- 第十三章 普希金(Pushikin)的《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 Onegin)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 (318)
- 第十四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及其《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
第二峰 (324)